

依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作者：琴都·鲍雅尔

在革命阵营内某些人说，《南国》双周刊(以下简称《南国》)惯于搞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纳萨尔巴里的旗帜反对纳萨尔巴里的可耻勾当。”——《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说，《南国》变成了反革命了。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反对革命，完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现在来说，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南国》站在这四个敌人方面，还是站在这四座大山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南国》与这四个敌人进行了剧烈的斗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为了开展人民战争，推翻这四座大山正在积极地进行工作。《南国》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不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人民战争。在农村在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作组织工作。搞这一切工作是为了推翻这四座大山，还是支持这四座大山呢？我们为了推翻这四座大山正在进行工作，因此，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进行工作的。我们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毛主义者。因此说我们是反革命的人是反毛(泽东)的，他们在革命人民中间制造混乱。毛泽东说，谁是反革命？那些支持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以及为它们效劳的人都是反革命的。因此，那些把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看作唯一的利益的人，那些诚心诚意要推翻四座大山的人，那些不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任意地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

《爱国者》周报在一篇文章中说，“革命者庄严地宣誓：‘谁不承认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下的印共(马列)的革命权威，就与谁没有合作的余地。’”这难道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口头上说承认中国党的领导，而事实上是反对的。因为中国党说，“毛主席在当时还指出，我们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农，团结其他革命分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周报》第六十九期。中国领导说，“团结其他革命分子”，而印共(马列)的机关报《爱国者》周报不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并用非马克思的语言加以指责。

“他们(指印共[马列一译注])抛弃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投身到建党的工作去。”但是从这种说法中可以得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全面的、极端的、片面的。

毛泽东同志说：“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文版，第六三〇页。

毛泽东说，即使强调了武装斗争，但是还必须开展其它形式的斗争。但是《爱国者》周报片面地反对这种斗争，反对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的群众组织，国际领导说，“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我们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异常。在中共韶山党支部的具体领导下，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游行示威、政治集会的队伍浩浩荡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爱国者》周报十月十六日，《北京周报》第六十九期。国际领导说明了革命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这种革命群众组织有助于开展人民战争，加强武装斗争；而印共(马列)片面地反对革命的群众组织，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口头上他们也说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只是建立群众组织——如果认为只是建立群众组织，党组织自然而然地就会建立起来，这种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想。《南国》对这种思想正在进行不懈的斗争。《爱国者》周报也为反对这条路线而进行斗争，发表了题为《一条危险的路线》的文章。

《爱国者》周报曾经连篇累牍地发表工会选举胜利的消息。但是在反对或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非常缺乏必要的耐心和自我批评，又执行了另一个极端的路线。此外，制造这样的一种气氛：好象是没有必要有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一切由党组织代替。虽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在斯里卡库兰和曼蒂尼波尔已经建立了革命的群众组织，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把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看作是十分简单的工作。因此污蔑《南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一九六六年起，《南国》把建党工作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看作是主要的工作。《南国》根据这个思想来进行工作，并且在谈到迫切需要及时地组织革命的群众组织时一直认为，革命的组织将加强农村的武装斗争，将组织农村和城市的斗争和人民的运动。因此，《南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工作的。

国际领导又说：“印度共产党(马列)的党员和其他印度革命者为实现推翻印度反动统治和使人民从剥削和压迫中取得完全解放的伟大理想，深入到封建主义压迫严重和阶级斗争尖锐的一切地方去进行工作。”——《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周报》第四十四期。中国共产党承认其他印度革命派和印度共产党(与列)同时存在。而印共(马列)的领导采取非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污蔑我们说，《南国》是所谓“政治掮客”(《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这种污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其结果，在建立革命人民的团结方面添设了巨大的阻碍，帮助了阶级敌人。今天必须建立革命群众和革命的

阶级的团结。但是按照《爱国者》周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谩骂决不能有助于建立这个团结。而国际领导特别强调这种团结。

说什么《南国》是所谓“大政治家或理论家”（《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种指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说：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因此，开展思想和理论的斗争是特别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同志又说：“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毛泽东同志说，“思想和政治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斯大林同志也把“革命的理论”看作是指南。伟大的列宁说，“**沒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如果《南国》按照这些伟大导师的指导，正确强调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对它进行污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呢？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工作呢？因为，国际领导说，“我们韶山人民和全国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同印度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就会变成威力无穷的精种原子弹。”——《北京周报》第三十八期，《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南国》根据国际领导的指示，利用它的有限的能力进行思想、理论和政治工作。因此，如果不进行任何思想分析，就污蔑《南国》，就意味着借毛泽东思想名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诚肯地希望所有共产党革命派更要百倍地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与国际领导的看法是一致的，应该掀起意识形态斗争的风暴。按照矛盾论求分析：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和人民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部联系。如：参加人民战争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丰富毛泽东思想；而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开辟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场所，把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引向正确的、持久的、胜利的道路。

林彪同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在阐明意识形态斗争的深远意义时，用毛主席的非常重要的语录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今天，这对印度革命来说有特别重要意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假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印度人民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都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恳切要求那些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工作污蔑成当“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人要深刻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在“九大”报告中林彪同志用的另一段毛主席语录也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要便印度的人民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就必须使千百万人民参加持久人民战争。如果使千百万人民提高觉悟，就必须开展“大辩论”。《南国》为此正在积极进行。《南国》为了推动大辩论号召革命人民参加意识形态和理论的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武装斗争。

《南国》只是忙于搞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南国》从一开始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学习和在工作中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南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深入各个农村地区。《南国》制订了在农村地区的工作纲领。《南国》的一切干部和工作人员强调在受封建压迫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的一切地方进行工作。按照国际领导的指示，“他们把在农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他们的首要任务，在贫农中热情地传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关于在农村地区各阶级的经济情况 and 政治态度的典型调查，制订在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提出在农村地区发动农民革命和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北京周报》第四十四期，《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提高革命农民的觉悟和组织农民之后，《南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首先帮助建立农民的武装组织——游击小组和农民自卫队，以便向农村地区的封建主义势力进行进攻，并消灭之，这样来把武装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我们在组织上是薄弱的，并且要克服自发倾向。只有向自发倾向作斗争，才能团结起来。

《南国》强调农村工作，并不是轻视城市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说：“**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南国》在城市进行工作，是按照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和方法进行的。如：现代中国革命史说：“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党在工人住宅区开办夜校，用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最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斗争。在进行斗争时和斗争取得胜利后，一刻也不要忽视组织工人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南国》也或多或少在工人中进行了工作。《南国》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城市工人、学生、青年的政治觉悟，应该建立千百个革命政治组织。

《南国》在工作中一直试图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南国》不认为，只有经过组织选举建立各级委员会，才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唯一标准。选举的必要性当然是存在着的。但是，《南国》不认为，通过选举而产生的任何组织，才是维护了民主。许多人认为，各级委员会是通过选举由下而上产生的，因此完全正确的。这种想法完全是机械的。在许多情况下，选举可能受到合法化和派性的约束。请回顾一下丹吉集团以及后来的孙达拉雅—普罗莫德·达斯·古普塔集团吧。因此，虽然选举是必要的，但光为选举而大喊大呼是不行的。印度共产党(马列)或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是否由选举产生的，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问题是，要看组织内部是否已经真正造成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大问题是，由上而下都应该有进行批评的权利。任何党派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过上一级领导，包括直接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和更高级的领导报告。《南国》将不给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宣布为修正主义分子，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它将一定要耐心地听取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意见，并加以说服他们。它将努力地使他们克服错误思想。《南国》将试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组织纪律，《南国》认为：

- (一) 个人服从组织；
- (二) 少数服从多数；
- (三) 下级服从上级；
- (四) 全党服从中央。

《南国》认为，凡是坚持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局面的组织，它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真正的组织。我们支持对人民的敌人进行的任何斗争。《南国》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种斗争推向前进。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只要这场斗争有人民参加，并且是打击阶级敌人和国家政权的，《南国》将一定要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并且把它推向前进。《南国》将不会考虑因这场斗争是某某领导的，因而退出这场斗争。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南国》将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它将依据这种政治，阐述这场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对这场斗争

的领导者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甚至必须揭露领导者的反动的本质。通过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建立革命的组织，为建党打下基础。在《南国》看来，把斗争利益、革命利益看作是大于一切，把人民战争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某个人处于领导地位这不是大于一切问题。革命利益是否得到了，这是大问题。因此，《南国》将全力以赴地投入推翻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所有的斗争中去。《南国》将全力支持一切斗争，以促使人民民主革命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而且自己也积极参加进去。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它决不会成为障碍。问题是，群众是否参加这场斗争。《南国》将对群众的参加始终给予以高度的评价，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南国》将一刻也不会忘掉人民群众的这一重大的作用。

《南国》从来也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采用那种敌对的批评方法。虽然在革命阵营里有些人采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去进行批评，但《南国》将决不会进行不友好的批评。“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七-八二八页。这是一条真理。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都应该是友好的。《南国》不是为了把人推到反革命的阵营里去而进行批评的。《南国》对其他共产党革命派也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在批评《南国》的时候，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应把批评当作咒骂或污蔑。

比如说，一位突然出现的名叫埃·巴苏的人，在前些日子，即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爱园者》周报上发表了题为《在写历史的幕后的政治》的一封信。写信者在信中实际上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方法踩在脚下，并级匆忙忙作出决定，处心积虑地对《南国》进行了攻击，从而完成了其革命任务。写信者在谈到由苏普拉卡希·罗易写的和“急进书店”出版的名叫《卡格特菲伯、松纳尔波尔和彭格尔的农民斗争》的小册子时说，因为，《南国》在很久以前连续地发表了这篇文章，因而罗易是《南国》的理论家。虽然写信者自己也承认，在《南国》上连续地发表的文章同目前由“急进书店”所出版的罗易写的小册子有很大的区别。凡是在《南国》上发表的所有的文章的责任都由《南国》来负担，但是其它出版者所再版的文章，《南国》一概不负责任。这是众周所知的。当写文章来进行咒骂的时候，当然不会考虑到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写信者引证罗易的文章的那部分并进行了“批评”（？），《南国》对其中的一段根本没有发表。所有一切都发表在由“急进书店”新出版的小册子上，但是写信者突然跳起来，忘掉了革命的方法，并且开始进行咒骂。写信者在信里把罗易说成“反革命”。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有应尽的责任正确区分人民和敌人的问题，并根据这种情况加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语录。他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两类矛盾的性质和它的解决办法混为一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同时，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只有我们掌握好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批评的方法，才能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对罗易的文章进行批判时应该看到，他在写农民斗争的历史中，他的成绩究竟有多大？他的错误有多少？他的功绩到底多大呢？我们认为，每个共产党革命派都要有历史知识。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关于研究历史的极其重要性。比如，他在谈到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情况时说：“**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历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曾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版第七九七页）

我们今天的情况跟中国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因此研究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农民、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及其政治教训，当然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农民的斗争的觉悟以及他们英勇牺牲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得很少。当然，最近有些人着手写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任何理由忽视罗易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如果说，在他的文章中有什么缺点、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在某些地方有什么政治漏洞，应该抱友好的态度，热情地帮助他克服之。这也有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难道光背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而不把它贯彻于实践吗？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去。正如，作者罗易在《卡格特菲伯、松纳尔波尔和彭格尔农民斗争》一文中谈到的：“从纳萨尔巴里蔓延的斗争烈火今天已把孟加拉邦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烧成灰烬。总而言之，纳萨尔巴里的斗争是农民反对统治集团的武装进攻的革命反抗，是农民为着土地和生存而开展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是工农斗争的一种高级形势。”——（《南国》一九六八年，第七、八期合刊第四页）作者把它说成高级形式是对的，但应该把高级形式方面的问题表达的更清楚一些（不应当删去）。他应当理解和应当强调指出，纳萨尔巴里的斗争不单纯是为夺地，而是为了夺权。在我们看来，这是作者在写作和理解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但是，写信者则没有找到在《南国》发表的这篇文章的这个弱点，而是带着谩骂的情绪去批判（？），反而抛弃了主要的东西。在这方面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们千万不能走这条路，要是走这条路就会扼杀作者的起码的努力，首先把他当作“反革命”，然后给他脸上抹黑。正如今天在许多方

面发生的事情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毕竟还是发生了。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用解决对抗性的或敌对性的矛盾的方法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或非对抗性的矛盾，反而给我们的敌人提供机会。这不是一种粗暴的、忍耐不住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的表现吗？我们一直主张共产党革命派考虑这个问题，并号召他们对这种有害的和给敌人提供机会的行为进行斗争。我们的斗争口号是团结-批评-团结。

《南国》认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因为，除掉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南国》没有私利。具有武装斗争和其它斗争经验(包括特仑甘纳在内)的所有印度革命派如用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帮助我们，我们将热情地和虚心地接受这种帮助。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工作经验给我们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么我们一定将毫不犹豫地纠正我们的错误。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南国》现在和将来都采取这个方法去进行批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过：“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南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是为了达到革命阶级和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因为，如果没有革命人民的巩固的团结，就不可能领导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所以，为了在人民群众之间越来越团结，《南国》将贯彻“团结-批评-团结”一这个民主方法。

《南国》将不会片面地考虑任何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对《南国》片面地进行污蔑。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南国》决不会片面地谴责任何共产党革命派，将米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南国》将牢记毛主席的方法，为了革命利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一切事情都要进行分析，并且以友好的批评态度指出事情的好坏两个方面。我们说，印度的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干革命总要有千百万人参加。团结这些人是共产党革命派当前的迫切任务。没有革命人民的团结，就不可能消灭印度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坚持持久人民战争，使土地革命获得胜利。《南国》牢记革命人民的这种团结并按照毛泽东所指示的方法去进行批评。国际领导就团结问题，最近指出：“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干革命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南国》热切地希望：革命阵营里的大多数人将执行国际领导所指出的“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的原则，并把它贯彻于他们的一切工作中去。因为，在印度的革命形式下，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引证毛主席的一条语录来结束这个评论。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译自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南国》双周刊

摘自《印度一些革命派的重要文件、文章汇编》